

台灣之日本研究的困境與改善*

何思慎

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華人社會對日本的研究，由來已久。中國最早記載日本的文獻是《山海經》，而西元 289 年（晉太康 10 年）陳壽所著《三國志·東夷傳》則首度有系統地記述日本的情況。因此，華人研究日本可謂已有 1700 餘年的歷史。

近代日本明治維新後，積極學習歐洲，實行維新改革，迅速走上現代化道路，1871 年 9 月清廷與日本簽定《日清修好條規》，正式建立外交關係，1877 年清廷設駐日公使館，駐日外交人員利用職務之便，廣結友人，多方搜集資料，展開近代華人的日本研究。其中駐日參贊黃遵憲所著《日本國志》為當時諸多研究成果中之代表作。

1895 年甲午戰敗，清廷割讓台灣，也讓台灣開啟另一華人社會的日本研究。因此，台、日兩國不僅地理位置相近，亦曾共有過一段歷史。從 1895 年（明治 28 年）至 1945 年（昭和 20 年）間，台灣曾經是日本的一部分，也因此許多的日本人對台灣擁有一種特殊的親近感。

同時，台灣對日本亦不陌生，在台灣的文化與都市景觀中遺有諸多鮮明的日本風。六十五歲以上曾受教日本教育的台灣人也大多能操流利的日語。此外，當南韓尚對日本的影音資訊採取管制措施時，台灣時下年輕人卻被稱為「哈日族」，瘋狂地追逐日本的流行文化。在台灣의 電視頻道中，亦不乏日本的節目，其中更有其他國家所未見的「日本台」，¹全天候播送日本各大電視媒體的節目。同時，台灣緊鄰日本，本島宜蘭縣與日本最西邊的領土—與那國島僅距約 110

* 本文初稿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主辦，「台灣的日本研究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2004 年 5 月 28 日。

¹ 目前台灣有線電視中的日本台除日本NHK亞洲台外，尚有國興、JET與緯來日本台。

公里，所以更可直接收視日本國內的衛星放送（BS放送），與日本當地無時差地接受共同的資訊。²

但是，目前處於社會中堅，40 歲至 65 歲此一年齡層卻多半具「反日」情結。當然，這應可歸因於戰後兩位蔣總統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在台灣所進行之「去日本化」教育。因此，戰後台灣約有 40 餘年的時間，學界無法廣泛且客觀地研究日本，直到李登輝總統全面主政後，此狀況始獲得改善。關心台灣問題的日本學者認為，1992 年中學歷史教科書《認識台灣》的編纂，為台灣教育中「日本觀」改變的開始，而在此之前的教科書則論述著日本帝國主義如何地將台灣視為餌食（中村勝範 2000）。

因此，戰後的台灣並不乏會日語的人，但若談到所謂的「日本研究」（Japan Studies），則因受制於政治力，台灣可說是尚未建立起自己的「日本研究」。本文即是基於此背景，對當前台灣之日本的困境提出分析，並借鑑美國與中國大陸的經驗，試圖提出可能的解決之道。

二、何謂「日本研究」

所謂的「日本研究」，在定義、內涵乃至是否能構成一門獨立的學科，學界的意見未見一致。然而，由此也客觀地反映出「日本研究」是屬綜合性的研究，國際間也早已對日本進行廣泛的研究。而學界亦由不同取向的研究方法將現今的日本研究區分成三個類項（白井祥子 1996：455）：

（一）人文科學之傳統的文化研究為取向的「日本學」（Japanology）。

（二）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學際的綜合研究、區域研究為取向之「日本的研究」（Japanese Studies）

（三）以社會科學領域為中心的現代「日本研究」（Japan Studies）。

但不論是何種研究取向，「日本研究」或「日本學」必須從學術中立的立場上，全面觀察日本，不能失之偏頗，如此始有助於人們深刻地理解日本，且客觀地評價日本。

此外，一個國家的特點，只有在與他國比較之下，才能突顯出來，而且，這樣的比較研究必須是多角度、多方面與多層次的。而比較研究之方法除可採用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途徑外，也應吸納某些自然科學的新研究方法與現代

² 台灣可安裝與日本國內相同的衛星電視接收器（tuner），同步接收日本的衛星數位放送，消費多樣化的日本資訊。

化的研究手法。因此，「日本研究」此學術中的新學門的研究乃採取比較研究、科際整合與新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

三、台灣日本研究的緣起與發展

1928年4月，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前身）成立，成為台灣史上第一所大學，下設文政與理農兩個學院。台北帝大的成立也為台灣在地的日本研究揭開序幕。但當時的數據證明，當越來越多的日本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同時，台灣人卻相對地越來越少（林茂生 2000：239），特別是人文學科專攻的台人更是鳳毛麟角。因此，當時以台北帝大為中心展開的「日本研究」，其研究群乃以日人為主（陳明姿 2003）。

1945年8月日本戰敗，國民政府統治台灣，勵行「去日本化」政策，嚴禁日語教學與在公開場合使用日語，台灣的「日本研究」亦因之進入蟄伏狀態。1963年中國文化學院（現中國文化大學）成立東方語文學系，下設日文組，重啟台灣的日語教育與對日研究。其後，淡江、輔仁與東吳相繼成立日文系組，台灣的「日本研究」也重露曙光。1970年代，戰後赴日的第一代留學生陸續取得學位，如許介麟、戴國輝、李鴻禧、蔡茂豐等人，但受制於日本的學位授與制度，有更多的留學生，在修畢博士課程後，無法順利取得學位，因此赴日留學不並吸引當時台灣有志深造者。再者，亦有受過日本教育通曉日語之台籍人士，以日本相關研究在台灣完成博士論文，如陳水逢、黃爾璇等人。

與日語教育相似地，台灣在戰後很長的一段時期，日本問題的研究更受到嚴重的抑制。在兩位蔣總統時代，台灣的大專院校中設有日文相關科系者只僅限前述四所大學，再加上國立台中商專（現台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科。因此，在缺乏通曉日文的年輕人投入的情況下，台灣對日本的研究基本上只依靠少數曾受完整日本教育的知識分子。而這也造成台灣「日本研究」的世代斷層。

在李總統主政之後，由於他個人對日本的特殊情感，調整了台灣對日本的文化政策，日文系在台灣的大學院校中，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台灣與日本之間的文化交流也較過去蓬勃發展。在台灣的日常生活中，我們早已習慣日本的商品，年輕人當中，更有許多人對日本懷有濃厚親近感，日語也成為彼等最想學會的外語之一。在中學與大學普遍開放英語之外的第二外語之學習時，日語立刻成為學子們的最愛。為因應市場的需求，目前全台共有43所大學院校設有日文相關科系，每年畢業生超過5,000人。

然而，目前台灣仍未從對日語的學習走上對日本的學術研究。著名的文學家豐子愷認為學習外語的乃為研究該國開啟一扇門。過去台灣各大學日文系之畢業生深造時多往文學、語學的方向發展，而這也限制了台灣建立起綜合性的日本學研究。但是，近年來大學日文系所之課程已逐漸多樣化，不再局限於文學與語學，而這也使日文系所之畢業生，在學術研究上開始能朝其他的學群發展。

同時，更重要的是台灣外語教育不再獨尊美語，這提供了非日文系的學生同樣有機會學習日語。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學生在習得日語後，亦能各自地從自己的專業領域出發，深入地研究日本問題。而這使得台灣未來有機會迎頭趕上世界的學術潮流，發展多學科的綜合性「日本研究」。

四、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日本研究」概況

在分析台灣「日本研究」的困境前，我們應先了解其他國家進行「日本研究」的概況，以收「他山之石」的效果。

首先就美國的情況進行了解。美國在 20 世紀初由於日本的移民問題，開始著手進行「日本學」研究。二次世界大戰，由美國政府主持進行交戰國語言日語的學習與研究戰後佔領日本的具體政策，大力展開強調科際整合的日本綜合研究，造成「日本研究」在質與量上的明顯進步。戰後，哈佛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等名校亦先後成立「日本研究中心」，在戰前的研究基礎上，推動對日本之近代化問題的研究，而在晚近，屬於法學院與商學院的有關貿易、金融、投資等的日本研究則是美國日本學發展的另一重點（讀賣新聞 2000.08.10 6 版）。

1965 年以後，隨著日本經濟的高度成長，日本大企業更開始積極地資助美國學界的日本研究。此外，美日大學間的協定與姐妹城市的建立也促進了美國的日本研究。³根據 1989 年國際交流基金會的調查，全美設有日本研究科與講座的高等教育研究機構有 337 所，而研究者與專家也為數眾多，研究對象領域也從傳統的日本文化往包括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在內的多樣發展。

此外，在 1963 年，哈佛、史丹佛、哥倫比亞等 16 所知名大學更聯合地在日本成立一個日本研究中心，在現地培養來自美國與加拿大的日本專家。該研究中心主任肯尼士·巴特拉是美國知名之專攻《平家物語》的日本古典文學專

³ 例如，與日本滋賀縣結為姐妹州的密西根州的 15 所大學在 1988 年在滋賀縣彥根市設立了密西根大學聯合日本中心，並且為研究日本語、日本文化的目的，每年均向該中心派遣留學生。

家，但該中心的研究群卻遍及文學、歷史、政治與經濟等領域（讀壳新聞 2000.08.10 6 版）。

其次再觀察另一個華人社會—中國大陸的「日本研究」發展概況。中國大陸在 1980 年代之前，中國大陸的日本學研究基本上是受到政治與日「中」關係發展之嚴重干擾，此時期，只有零星的研究成果出現。但在日「中」關係正常化與中共改革開放之後，過去困擾日本研究的敵國意識逐漸消除，中國大陸形成一股「日本熱」。幾年間，大學的日語專業成倍數增加，各種研究機構紛紛設立，各類專門性的研究刊物也接踵而出。

1980 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共創辦 57 種日本研究雜誌，其中雖有部分停刊，但截至目前仍有 34 種日本研究相關期刊正常出刊，這些期刊分屬大陸 11 個省、市的 28 個日本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而主要「日本研究」機構出版發行的專業期刊即有《日本學研究》（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日本學》（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日本問題研究》（河北大學日本研究所）、《現代日本經濟》（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吉林大學日本研究所）、《日本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中心）、《日本文化研究》（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日本市場經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市場經濟研究中心）、《日本研究論集》（南開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日本問題資料》⁴（已停刊）與《現代日本》（天津市現代日本研究所）等。⁵根據《日本問題資料》1992 年第 4、5 期合刊所載的「日本學研究論文目錄索引（1978-1991）」，僅八種期刊所發表的「日本研究」相關論文即達 4,200 多篇。此外，《中國日本學文獻總目錄》一書統計更顯示，自中共建政以來至 1993 年 3 月，全中國大陸共發表日本研究論文 19,465 篇，當中近 9 成為大陸學者所撰，且多數為改革開放以後所發表（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 1995）。這些統計資料客觀地反映出 1980 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積極地發展「日本研究」之實況，同時也呈現其研究的多樣性。

中國大陸的學術重鎮北京大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日本研究也因應世界之學術潮流，採取多學科的研究，幾乎所有的人文社會各學科都有日本研究者，因此，北大日本研究中心所出版的年刊《日本學》所登載的論文也含蓋政治、法律、外交、經濟、社會、教育、文化、思想、文學、民俗、歷史等各領域。

⁴ 此期刊屬資料目錄刊集，主要與北京圖書館（現中國大陸「國家圖書館」）合作，將中、日、文之日本研究相關資料通報研究者。

⁵ 有關近年中國大陸日本研究相關期刊的調查，詳參林昶（2001：112-215）。

而從在該學刊發表之學者來看，年輕世代正在成為中國大陸「日本研究」的主力（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 1995：352-385）。

此外，日本為推動國際性的日本綜合性研究，協助研究者的學術工作，1987年成立了直屬文部省的大學共同利用機構－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積極地於國際間協助並整合「日本研究」。

總的來看，「日本研究」已成學界研究之重點，各學術機構除成立「日本研究中心」進行對日本之專門研究外，亦有「區域研究」機構，從歷史、文化、語言、文學、宗教、政治、法律等人文社會科學的各種視角，從事日本綜合研究，如：耶魯大學國際與區域研究中心⁶（Yal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Yale University）、加州伯克萊大學國際與區域研究⁷（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UC Berkley）、牛津大學聖安東尼學院區域研究中心⁸（Area Studies Center, St. Anthony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芝加哥大學區域研究中心⁹（Area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五、台灣之「日本研究」的困境

如前所述，台灣近年來日文相關科系雖如雨後春筍的設立，在各大學中，亦多以第二外語的方式，讓其他科系的學生有機會修習日文。據調查日文在台灣已是美語之外，學習人數與學習意願最高的外語（孫寅華 2001：23）。因此，台灣基本上已解決戰後一段時期曾面臨的缺乏年輕一代日語人材之問題。然而，尚待克服的問題是如何將這些具日文基礎的人力，導引到「日本研究」，使之成為日本專家。

但是，在台灣日文系中設有研究所的並不多，¹⁰其中除淡江、文化兩校之日本研究所外，多以文學、語學（含日本語教育）與文化的研究為主要之研究領域（川島真 2003：13-23）。同時，這些研究所的入學考科，除日文翻譯、作文外，專業科目普遍以日本文學史、日本語言學等為主，對於其他想專攻其他領域的學生而言，並不適合。此外，在台灣想進入學術界從事專門的研究工作，博士學位已成基本的要求，但國內目前設有博士課程的日文系只有以日本

⁶ 詳參該機構網頁，網址：<http://www.yale.edu/ycias/degrees.htm>

⁷ 詳參該機構網頁，網址：<http://ias.berkeley.edu/>

⁸ 詳參該機構網頁，網址：<http://www.sant.ox.ac.uk/areastudies/>

⁹ 詳參該機構網頁，網址：<http://internationalstudies.uchicago.edu/>

¹⁰ 目前設有研究所碩士班的日文系，只有台大、政大、輔仁、東吳、淡江、文化、銘傳、長榮與高雄第一科大等九校。

語教育為研究導向的東吳大學，每年只招收 2 名研究生，且截至 2001 年度（90 學年度），只有 11 位研究生順利取得博士學位。¹¹

當然，日文系之外，其他科系之近年來亦有些碩、博士研究生投入「日本研究」，例如，政大東亞研究所、政大政治學研究所、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等，其中，政大東亞所以東亞區域研究為專業，近年來研究對象除中國大陸外，已有多位諳日語之研究生投入「日本研究」，並有 2 位先後完成博士學位。在國內日本相關研究所多數尚未成立博士班之前，這些科系將暫時扮演本土培養「日本研究」人材的重要角色。

惟目前國內在政治、經濟、歷史、社會與文化等系所中雖不乏觸及日本之相關研究，但卻缺乏專門從事「日本研究」之師資，且多數研究生亦面臨日語能力上的障礙，無法迅速正確地閱讀日文的一手資料，進行具原創性之日本問題研究。相對地，近年來日文相關系所雖呈現跨領域、跨學門的發展趨勢，但囿於學生在社會科學上的專業訓練不足，仍難以進行文學、語學或日本語教育之外的其他領域研究，造成台灣「日本研究」的局限性。調查顯示，台灣的日語學習者仍以「語言」、「文化」為主要學習目標，對「日本的政治濟社會知識」感到興趣者仍居少數。¹²因此，如何突破目前台灣的學術框架，強化日文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橫向連結即成為首要之務。

此外，台灣目前與「日本研究」相關的專業學會有「台灣日本語文學會」、「台灣日語教育學會」、「台灣應用日語學會」、「台灣日本語語言文藝研究學會」與「中日關係研究會」，前四者以台灣各大學院校日文相關科系之教師與研究生為主要會員，但學術領域局限在文學、語學、日本語教育與文化，而非日本綜合研究之學會，但此亦客觀反映出台灣的日文科系師資多局限在上述領域的事實；至於後者基本上則屬政治性機構，雖定期發行《日本研究》刊物，¹³但難以發揮集聚從事中日關係相關研究之學者，帶動台灣「日本研究」風氣之效。因此，如何整合國內目前相關之學會，擴大專業領域，廣納「日本研究」學者，以期台灣能真正發展出跨領域之日本區域研究，實為當務之急。

¹¹ 詳參東吳大學日文系網頁，網址是：<http://www.scu.edu.tw/japanese/>。

¹² 高等教育中的日語學習者，以獲得「日本的政治濟社會知識」為目的者僅有一成。詳參藤井彰二（2004）。

¹³ 該刊物綜合性評論月刊，側重日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與歷史的分析報導，其中側重日本政治評論，惟不具審查制度，非屬學術期刊。

六、改善台灣「日本研究」的具體建議

台灣在「日本研究」上雖面臨前述的諸多問題，但仍具研究日本的重要基礎。首先，台灣擁有不少通曉日語的人材；再者，台灣與日本近在咫尺，往來便捷，且雙方文化背景具相似性（proximity），日本的各項發展經驗，經常成為台灣師法的對象，因而雙方也擁有密切的互動往來關係。因此，台灣實具備發展「日本研究」的主客觀條件，只要借鑑他國的經驗，有效整合日語人材與學術資源，即能突破當前的瓶頸，全面改善面臨的困境。以下即對台灣「日本研究」的發展，提出幾項具體方案，希望對「日本研究」之提昇有所裨益。

（一）改革現有大學日文系（所）之課程

國內日文系教育發展雖已逾 30 年，惟過去各日文系的發展重點偏向日本文學、語學與日本語教育，近年雖有許多應用日語系成立，課程有逐漸多元化的趨勢，但日本法政、經濟、歷史、社會等專業在日文系中仍屬邊陲，建議政府以學術資源的重新配置，引導現有大學日文系（特別是設有研究所碩、博士班的學校）借鑒日、韓等國外國語大學之發展經驗，與其他系所合作或擴大師資群之學術領域，強化日本法政、經濟、社會、歷史等領域的發展，以化解我國未來在政經與社會文化領域對日研究與交流的人才斷層危機。

（二）鼓勵各大學開設「日本研究」相關課程

仿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補助各大學開設「中國大陸研究」相關課程之方式，由外交部或亞東關係協會對各大學「日本研究」課程提供經費補助，帶動學界研究日本問題之風氣。

（三）在大學或研究機構設立「日本研究中心」

過去台灣大學與中山大學均曾設立「日本研究中心」，但受限於經費與人員編制，¹⁴無法順利發展，達到預期目標，十分可惜。¹⁵因此，教育部、國科會、外交部等相關部會應在經費上支持大學或中央研究院等研究機構設立「日本研

¹⁴ 例如，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 9 條規定，「所有經費（含人事費）皆由中心自行爭取之委託計畫或其他自給自足方式支出」。該設置辦法詳參中山大學網頁，網址：<http://www.ora.nsysu.edu.tw/db/docu/4-89.doc>

¹⁵ 台灣大學日本綜合研究中心目前陷於停頓狀態，而中山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亦在 91 學年度遭裁撤。

究中心」，整合各方學術人力支援，形成跨領域之學術平台，對日本展開全面、深入的研究，並發行日本綜合研究的專門學術期刊。¹⁶

(四) 建立完善之「日本研究」資料庫 (Data Bank)

日本研究資料庫可謂是台灣之「日本研究」的重要基礎建設 (infrastructure)，應由國科會補助適當的學術機構建構之。透過網頁平台整合「日本研究」之相關資料與研究成果，讓研究者能自行設定關鍵字，進行相關資料內容的全文檢索。如此，不僅能有效突破過去在資料取得上所受到之地域限制外，更能發揮團隊合作，達到共享研究資料，迅速積累並深化研究的效果。¹⁷

(五) 鼓勵學生留日

近年來中國大陸留日學生日增，除強化了其國內「日本研究」的學術隊伍外，更有些人直接留在日本學界工作，對日本之輿論產生一定的影響力，使中國大陸的「日本研究」在日本亦受到一定的評價 (川島真 2003: 29)。建議政府鼓勵國內年輕學子赴日留學，或與日本之大學簽訂學術合作計畫，仿效中國大陸與日本「土洋合作」的模式，在國內完成博士學分後，赴日由日方之教授指導論文。此外，更建議將優秀學生送到日本具影響力之教授研究室從事研究，建立師生情誼，也在日本打下深厚之學術人脈，協助台灣發展「日本研究」。

(六) 協調日本政府改革「交流協會赴日獎學金」制度

目前日本政府每年透過駐台外交機構交流協會贈送我國約 100 位學生獎學金，赴日留學，惟獎助期間只有 2 年，雖可再申請延長，然名額有限，無法滿足學生繼續攻讀博士的需求。因此，多數研究生在完成碩士學業後，旋即返國投入業界，無法投入「日本研究」工作。建議日本政府以「2 加 3」的方式，提供繼續攻讀博士課程的研究生後 3 年的獎助金，以協助養成台灣的「日本研究」

¹⁶ 台灣各大學院校日文系雖均定期發行相關之學術期刊，如台大的《台大日本語文研究》、政大的《政大日本研究論集》，輔大的《日本語日本文學》、東吳的《東吳日本語教育》等，但這些期刊所收錄的論文均屬文學、語學或日本語教育等領域，缺乏政治、經濟、社會等社會科學相關之論文。

¹⁷ 目前輔仁大學日文系(所)在校內研發處的補助下，著手建構「互動式日本研究專業搜尋引擎」，惟經費有限，資料庫功能尚未完備，該搜尋引擎的網址：<http://cjs.jp.fju.edu.tw>。

人材，擴充學界知日派，增進台灣對日的理解。

(七) 整合學界中通曉日文之日本研究專家與日本學者進行跨國研究出版計畫

由政府補助國內之日本研究學者與日本學界進行跨國整合型研究計畫，透過此計畫強化我方學者與日本直接對話的能力，並建立「人的關係」，增加我方學界在日本出版與在智庫或學會公開演說之機會，促進雙方知識社群互動，提高我國「日本研究」之學術成果在日本的能見度。

(八) 邀請日本學者來台擔任訪問學人

由教育部或國科會委由駐日代表處建立日本學者來台擔任訪問學人的管道與機會，協助台灣推動「日本研究」，並增進日本對台灣之認識與重視。

(九) 在大學院校設立日本研究講座

東京大學法學部在台灣的富邦文教基金會捐款贊助下，成立「富邦文教基金會台灣研究寄付講座」，計劃以5年的時間，總經費6,000萬日圓，針對日本統治前後的台灣法律發展、社會文化與台灣和鄰近國家關係等進行教學與研究，鼓勵日本學界研究台灣的風氣（中國時報 2004.05.14）。其實，台、日經貿往來密切，許多日本商社在台灣擁有龐大的經濟利益，實應回饋台灣社會，循富邦的模式捐資在台灣適當的大學院校中設立「日本研究講座」，提昇台灣「日本研究」的水平，以強化對日關係，共謀台、日之共同利益。

七、結語

台灣與日本不僅在經濟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且在東亞區域安全問題上更是命運共同體（中時電子報 2003.01.14）。同時，相對於中國大陸有半數的國民對日本不持好感，¹⁸台灣對日本卻是印象不惡，台灣甚至可謂是東亞少數的親日國家（鹿錫俊 2003）。然而，過去台灣與日本雖有密切的實務性往來，但弔詭的是對日本的學術性研究卻一直受漠視，甚至是來自政治上的限制，導致主觀上的對日情感與客觀上的對日理解存在明顯的落差。

¹⁸ 根據一項朝日新聞社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共同民調顯示，53%的中國大陸受訪者對日本具有嫌惡感，詳參毛里和子，張蘊嶺（2004：227）。

事實上，對日本問題進行學術性的專門研究不僅攸關台灣的學術發展，更直接地影響台、日兩國的外交關係。目前，在外交關係發展上，除了正式的外交管道之外，所謂「第二軌道」(track two)之重要性更是日益提昇。而雙方的「智庫」(think tank)正是「第二軌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智庫」在一國外交政策同心圓的位置雖位處外圍，比不上政府行政部門與國會的重要性，但智庫不似行政機構需處理每日的例行政務，較可進行一些具創造性與長期性的規劃，也可接受政府的委託計畫，從事一些「第二軌道」的外交工作，開啟新的政策思考方向，影響政府的外交決策(林正義 1999:106)。

在台灣高等教育體系中，日文相關係所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立，加上開放所謂「第二外語」的選修，日語學習人口正日益增加。如能有效地整合國內的學術資源，創造有利環境，形成「日本研究」學術平台，結合日語學習與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可預期未來將有更多的研究者投入「日本研究」之行列，壯大我國對日政策「智庫」的隊伍，在日本因意識形態、價值觀與政治體制而深化對台灣好感之際，進而順利地開啟台、日外交的「第二軌道」，突破目前對日工作的瓶頸。

參考書目

(一) 專書

- 川島真。2003。《台灣における日本研究》。東京：財団法人交流協會。
- 毛里和子，張蘊嶺編。2004。《日中關係をどう構築するか》。東京：岩波書店。
-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編。1995。《中國日本學文獻總目錄》。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
- 林水福主編。2001。《通識課程中第二外語教材、教法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外語學院。
- 林茂生。2000。《日本統治下台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林詠梅譯)。台北：新自然主義出版。
- 林昶。2001。《中國的日本研究雜誌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二) 期刊論文

- 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編。1995。〈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成員論著索引(1949—1993)〉。《日本學》，5：352-385。

白井祥子。1996。〈日本研究的現狀與展望：以歐美、大洋州、東南亞、中南美為中心〉。《日本學》，7。

林正義。1999。〈美國智庫與中美關係：網際網路的檢索〉。《戰略與國際研究》，1(1)：106-131。

鹿錫俊。2003。〈中日關係中的台灣問題：現狀與課題〉。《台灣研究》，62：73-78。

陳明姿。2003。〈台灣における日本文学研究の現状〉。交流協會日本語センター主辦，研究フォーラム「台湾から見た日本文学」—国際コラボレーションと新たな古典研究をめざして—，2003年11月23日，台北：交流協會日本語センター。

中村勝範。2000。〈陳水扁氏の総統就任演説を読んで〉。《ASIAN REPORT》，325：32-33。

藤井彰二。2004。〈平成15年度「台湾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事情調査」報告〉。《いろは》，15：1-4。

(三) 報紙

中時電子報。2003。〈日本交流協會所長：日台安保對話應該強化〉。2003年1月14日。網址：<http://news.chinatimes.com>。

中國時報。2004〈東京大學設台灣研究講座〉。2004年5月14日，A13版。

中國時報（台北）

讀売新聞（東京）